

郭振伟 著

钱钟书

隐喻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伟
著

钱钟书

隐喻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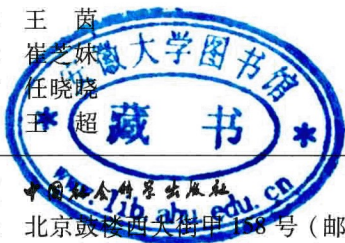
钱钟书隐喻理论研究 / 郭振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161 - 4288 - 2

I. ①钱… II. ①郭… III. ①钱钟书(1910~1998)—隐喻—
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1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362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崔芝琳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钱钟书隐喻理论，主要将钱钟书隐喻思想放置在当今认知语言学的大背景下，以西方隐喻理论为参照，从认知的视角对他著作中的隐喻思想进行挖掘和解读，以重新评估钱钟书先生在我国语言学、修辞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本书的写作缘起首先来自对当代隐喻研究蓬勃发展的认识。今天，隐喻被视为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利用某一领域的经验与认知来体验和诠释另一领域经验与认知的工具，由此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语言层面的隐喻仅是其外在表征之一，只有对语言中的隐喻进行深入思考，才能帮助我们认清隐喻的认知本质。在这种隐喻认知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也应该转换观察事物现象的角度，从全新的认知视角看待隐喻及已有的隐喻理论，从而纠正以往在修辞学视角下对隐喻现象的误读。钱钟书先生著作中有众多关于隐喻的思考与阐发，因此，从认知视角对这些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解读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本书的写作缘起还来自对我国当代隐喻学任务与目标的认识。我国的隐喻研究一直相对滞后，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比西方晚了十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得以完成，之后的研究也一直都是沿袭西方隐喻研究的老路，在既定理论框架下展开。因此，挖掘中国隐喻特色，开辟一条汉语隐喻研究的新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我国历史上的隐喻研究成果进行挖掘、整理，转换视角、重新发现其思想闪光点，是展开隐喻相对性研究的基础，也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一项任务。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试图将传统隐喻理论放在认知研究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钱钟书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作家、文学批评家，他一直对语言现象高度敏感，对修辞中的隐喻现象极为重视，留下了大量关于隐喻的宝贵论

述,内容涉及隐喻的本质、隐喻的功能、隐喻的基础、隐喻的工作机制等隐喻研究的基本问题,很多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修辞学的樊篱,从思维和认知层面对隐喻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因此,从认知角度对其隐喻思想进行整理和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汉语隐喻特色理论的建立有重要参考价值。

经过整理和研究,我们发现钱钟书先生的隐喻理论中体现出鲜明的认知维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对语言层面隐喻现象的考察入手,发掘出隐喻的认知本质,认为隐喻是人类重要的思维和认知工具,在认识世界、建立范畴、概念和思想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隐喻在文学、科学、生活等领域都普遍存在。

二是在洞悉隐喻本质的基础上,指出移情、通感都是隐喻现象,将“移情”这一传统美学概念推广到哲学、文学、科学,甚至人生观、宇宙观等领域,使其作用范围空前扩大,指出“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是艺术鉴赏以及观察体验世界的认知工具,将其理解上升到思维与认知层面,并重点对发生在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执情强物”和“即物生情”这两种移情现象进行了分析。对通感现象的考察兼及两个层面,其一是语言中的通感现象,其二是生理和心理层面的通感产生和工作机制,在现象描写的基础上概括了常见通感隐喻的映射规律,强调作家应主动结合个性体验对心理层面的感官联通进行描摹,制造语言中的新奇通感。

三是极为重视隐喻的语言修辞、社会修辞功能和认知、创新功能,对不同性质、不同层面隐喻的作用进行了辨析。我们看到,钱钟书先生把隐喻看作一种认知工具,是人类普遍的思维现象,这种对隐喻本质的深刻认识,正是在对隐喻功能与作用的分析探讨中逐渐形成的。钱钟书先生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关注到隐喻外显于语言表层的具体形式,对隐喻的外部修饰功能予以肯定,又能够深入思考语言形式与人类思想认知的关系,在隐喻形成的思维层面挖掘其认知功能,发现它在建立概念和思想系统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还通过对“《易》之象”和“《诗》之喻”的对比分析,从认知角度对说理性隐喻与文学性隐喻的不同功能加以辨析,并在创作中将这两类隐喻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四是对隐喻形成的基础和工作机制进行研究,提出“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的观点,强调了隐喻是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钱钟书先生

指出,隐喻在两类不同事物之间发生,是另一领域经验向某一领域经验的映射与转移。相似性是隐喻的基础,而差异性形成隐喻的前提。他认为隐喻两造之间的相似性存在差别,首先体现在性质上,有些相似性属于事物的固有属性,容易被人们观察和感知;有些则不那么明显,需要施喻者借助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眼光去发现和创造,隐喻构建主体的个性认知发挥着关键作用。其次体现在程度上,有的隐喻两造间相似性多,有的相似性少,但构建隐喻时并不是将两造间所有的相似性都实现映射,因此隐喻的发生有局部性特征,至于选取哪一点相似性,主要取决于具体情境、施喻者的表达意图和独特发现。这些观点都与认知语言学相关认识有一致之处。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相似性分为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但其本质都属于感知相似性;隐喻相似性也有程度之分,相同类属的事物之间相似性程度高,隐喻语义的生成有局部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在对比与参照下,我们可以明显发现钱钟书先生隐喻思想的认知高度。此外,他还指出,发现和创造隐喻相似性的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借助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要经历类比、判断、推理等抽象过程。尽管哲学家们认为隐喻不合逻辑,隐喻的构建也是产生于逻辑性基础之上的,隐喻不是不要逻辑,而是不受逻辑的束缚。他结合逻辑三段论推理阐发了隐喻生成中的逻辑性,其观点辩证而全面。

五是在始源域的选择和实现方面,钱钟书先生对“近取譬”和“远取譬”两种方式都很重视,尤其青睐“远取譬”。首先,他对隐喻“近取诸身”的现象非常关注,指出从《易·系辞》中的“近取诸身”、《诗经·大雅》中的“取譬不远”,到孔子提出的“能近取譬”,都强调从自己或熟悉的具体事物中选取始源域映射抽象目标域,“近取譬”是中西普遍的隐喻工作原理。他的文学创作中也有大量与传统“近取譬”一致的隐喻,但在两造间相似点的发现和创造上体现出鲜明的特色。相比之下,他更为重视的是“远取譬”,即反其道而行之,倾向于使用与目标域距离极远的事物作为始源域,从两个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之间寻找到独特的相似点,实现以抽象隐喻具体甚至以抽象隐喻抽象。我们认为,不管始源域的选择是“近”还是“远”,这种距离感实际上都是施喻者主观感知的结果,空间上的距离实质上都是认知中的距离。因此,通过隐喻,施喻者可以将原本感觉遥远的事物拉近、并置,创造出独特的相似点构建隐喻,“撮合语言眷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远”也就成了“近”。对隐喻始

源域的这一深刻认知使得钱钟书先生能够更加灵活地驾驭各种远近事物,“近取譬”与“远取譬”也在他这里变为同质现象。可见,钱钟书先生远近取譬的始源域实现方式都来源于他对客观事物的独特认知与体验,以及对大量隐喻现象的研究和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原则。

六是我们认为,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提出的“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思想,也建立在他对隐喻及其始源域深刻论析的基础上,更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客观性和辩证性。隐喻“两柄多边”理论历来是修辞研究的重点,但我们发现,从认知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剖析,会发现更多的闪光点。观察事物、构建隐喻时进行多角度转换,就会有新的发现,考察理论也应如此,我们现在对同一理论观察角度的改变也正体现了钱先生“两柄多边”理论的核心:“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在“两柄多边”理论中,钱钟书先生充分关注到认知主体思想、情感、观察视角以及时代、地域的不同对隐喻语义特征造成的差异,强调个性体验在隐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也进一步明确了隐喻具有提供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此外,钱先生对“两柄多边”理论的释证也涉及共时与历时两个层面,显示了先进的语言学理论眼光;他的“指同而旨则异”的观念还引入西方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认识到隐喻使用过程中引起的符号内部结构的变化,使得这一理论更具语言学价值。

七是我们看到,钱钟书先生对语言中特殊隐喻形式的考察,也源自他对隐喻认知本质的相关认识。钱钟书先生的隐喻理论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其理论基点就是将隐喻看成人类基本的思维工具,是认识世界的普遍方式,人类通过隐喻认识和探索未知世界,这就把隐喻从传统修辞学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修饰美化语言的手段,这样就能从宏观视角发现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例如移情、通感等,并且从认知角度对它们的发生原理、在建立人类思想系统中的独特作用加以阐释,从认知的角度为我们认识这两种语言现象的本质指明了方向。这种认知眼光同样体现在他对某些特殊隐喻形式的阐释中,比如他引进“曲喻”概念,在中外大量语料的对比中阐释其思维层面的工作原理;对博喻、类比、倒喻、反喻等隐喻形式也进行了认知角度的分析,这种理论认识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为他的隐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八是钱钟书先生对构建隐喻的见解也与当代认知语言学的主观性理论

相一致。认知语言学认为,主观性是隐喻的重要特征。钱钟书先生在创造新奇隐喻的过程中,往往能够从隐喻体现个人情感、独特视角和主观认识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发挥,通过大量的奇譬妙喻表明个人的立场、观点,体现出鲜明的主观性。他在借助个人独特体验与认知构建特定隐喻认知模型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洞察力、联想力,其隐喻创造中众多主观化手段的使用,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隐喻创造大师。

九是从钱钟书隐喻理论体系整体来看,他首先重视对现象的客观描写,继而力求全面阐释和打通,这也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目标相一致。在分析隐喻现象时,往往以某一隐喻具体形式为切入点,展开专题式讨论,其理论全面深邃、视野开阔,通常以自觉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意识,对同一隐喻现象展开横贯中西、沟通古今、旁征博引式的论述与阐释;他的不同论著中,也会针对同一隐喻现象随文点拨,保证其思想的前后贯通、相互勾连,显示出对不同隐喻现象的敏锐洞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也体现了理论体系的一贯性和成熟性。

十是钱钟书先生的隐喻理论与个人创作形成互文,两者相互依存,互为验证和补充。作为一位伟大学者,钱钟书先生擅长在理论著作中对隐喻现象做超越表象的深入思考,从认知的角度阐发出一整套隐喻理论,并在他不同阶段的著作中相互勾连,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隐喻认知理论体系;同时,作为杰出的作家,他在文学创作中更为注重对隐喻理论的实践,将自己对隐喻认知本质、隐喻功能、隐喻基础和工作原理等方面的理论认识充分运用于新奇隐喻的创制;即使是在《宋诗选注》这样的学术著述中,他也积极运用隐喻阐释深奥、抽象的思想理论,力求隐喻创作与相关理论的互文;同时,丰富的隐喻创作也为他积累了更多经验,经过多年的学术思考与积淀,更成为他隐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创作中概括和提炼出宝贵的隐喻思想,为对其隐喻认知理论的通观圆览提供佐证。

本书重点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在钱钟书隐喻认知本质的发现之下,明晰他各部分隐喻思想的相互系联与贯通;其次是他的隐喻理论与创作是如何相互阐释验证,交相映发,达到对隐喻认识的通观圆览的。

因此,我们将以认知隐喻学观点为参照,在考察其各类隐喻创作的基础上,对钱钟书先生在隐喻本质、隐喻功能、隐喻建立的基础、隐喻的始

源域特征、始源域的选择和实现，以及施喻者的个性体验、隐喻主观性、隐喻的中西对比等方面的发现进行整理，对其理论进行全新解读，以还原钱钟书先生的隐喻理论体系。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从认知视角对钱钟书隐喻思想进行解读，并不是就此否定以往从修辞学等方面所做的研究，而是旨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为观察和考察钱钟书隐喻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视点，为重新认识我国隐喻研究进程中的进步思想提供参考，也为早日建立汉语隐喻理论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黄华新教授的热心指导，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有关学者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笔者知识储备和个人阅历方面的缺陷，要将钱钟书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全部涉及绝非易事，因此书中纰漏在所难免，对钱先生的思想和理论也必然存在一些误读，但这些问题全由笔者自己负责。今后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将继续，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这一行列中来，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程。

郭振伟

2014年4月于杭州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思路和方法	(3)
三 研究焦点	(4)
四 研究目标	(7)
五 研究的创新点	(7)
第一章 相关研究现状	(9)
引言	(9)
一 国外隐喻认知研究概况	(9)
二 我国隐喻认知研究现状	(16)
三 我国隐喻语料库研究现状与展望	(23)
四 钱钟书隐喻研究现状	(32)
结语	(37)
第二章 隐喻本质论	(38)
引言	(38)
一 西方各流派对隐喻的定义	(39)
二 中国传统修辞学对隐喻本质的认识	(42)
三 钱钟书论隐喻的本质	(46)
结语	(55)

第三章 隐喻功能论	(57)
引言	(57)
一 中外学者论隐喻的修辞功能	(57)
二 隐喻的认知功能	(61)
三 钱钟书论隐喻的认知功能	(64)
四 钱钟书对说理性隐喻与文学性隐喻的区分	(68)
五 隐喻认知功能理论对其创作的指导	(76)
结语	(83)
第四章 隐喻相似性辩证观	(84)
引言	(84)
一 关于隐喻相似性的传统认识	(85)
二 钱钟书论隐喻的相似性	(88)
三 钱钟书创造隐喻相似性的指导原则	(102)
四 联想和类比——钱钟书创造相似性的主要方法	(112)
结语	(126)
第五章 近取譬与远取譬	(127)
引言	(127)
一 近取譬理论	(127)
二 论远取譬	(139)
三 钱钟书“以空喻时”隐喻理论与实践	(161)
结语	(173)
第六章 隐喻的两柄多边与移柄易边	(175)
引言	(175)
一 “喻之两柄”理论	(175)
二 喻之多边理论	(187)
三 隐喻创作中的移柄易边	(193)
四 钱钟书对“两柄多边”隐喻的分类	(195)
五 两柄多边理论的语言学意义	(199)

结语	(202)
第七章 论特殊隐喻现象	(204)
引言	(204)
一 移情	(205)
二 通感	(216)
三 曲喻	(227)
四 博喻	(238)
结语	(244)
第八章 钱钟书隐喻的主观性	(245)
引言	(245)
一 钱钟书隐喻的视角、情感和认识	(246)
二 隐喻相似性联想的主观性	(254)
三 隐喻认知模型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257)
结语	(259)
结论	(260)
主要参考文献	(264)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1980)一书中写道:“隐喻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维和行动中。我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是隐喻性的。”^① 书中指出,隐喻在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隐喻不是外在的语言表征,而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建立范畴的重要认知活动,人类的思维是基于隐喻认知的。这就对人们一直以来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现象的观点给予有力挑战,开辟了一条从新的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途径,真正确立了隐喻在认知中的地位,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隐喻认知研究的热潮。

目前隐喻已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当今隐喻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的多元化态势,但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现代隐喻学仍需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学科性质、学科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与深化;针对多元化发展同时造成的理论不统一、研究各自为政的问题,现代隐喻学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研究视野也需要进一步拓展。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隐喻的普遍性特征,研究语料也以英语居多,今后应在此基础上展开隐喻相对性的研究,以更多的语言验证隐喻认知特征,对不同语言中的隐喻现象进行如实充分的描写,区分不同语言中的隐喻,全面发现隐喻的构成和使用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完成隐喻的理论解释,力求建立统一完整的隐喻理论体系。

^①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3.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吸收和消化西方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隐喻进行挖掘和整理势在必行。从隐喻学研究基础来看,目前汉语隐喻研究已经具备两个十分有利的前提条件。

首先,汉语中有极为丰富的隐喻语料。众所周知,汉语是典型的意合语言,在日常语言和文献典籍中有大量民族特色鲜明的隐喻语例,这些基础语料有待我们去整理和分析,针对中国人的体验特征开展汉语隐喻研究,此项研究能帮我们突破语言工具论和任意性的樊篱,更好地从认知途径了解汉语隐喻工作机制,更接近隐喻的本质,对于开展中外隐喻模式的比较、建设汉语特色隐喻理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汉语文献中有大量关于隐喻的研究成果。尽管我国历史上隐喻一直被当作一种修辞格加以研究,没有像西方隐喻理论那样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认识,但中国学术研究也历来关注隐喻,从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收集到关于隐喻的真知灼见。自先秦时期始,诸子百家就十分重视论辩的作用,隐喻是他们阐述主张的有力工具,因此孔子、墨子、荀子、庄子等思想家都对隐喻的功能、定义和本质等问题发表了看法,此后很多学者的认识也颇有见地,尤其是集中讨论隐喻的论著的出现,更推动了隐喻研究逐渐深入,像西汉刘安的《淮南子》,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南宋陈骙的《文则》等,还有近代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等,对隐喻的研究越来越集中,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这些理论成果,也需要进行挖掘和整理,一方面可以如实展现中国隐喻研究的历史,另一方面,针对这些认识进行研究,分析学者们对中国特色隐喻的独特体验与认知,可以概括提炼出中国特色的隐喻认知,从而总结汉语隐喻工作机制和相关理论,为建立完整的隐喻理论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在众多的隐喻研究者中,钱钟书先生无疑是最受人瞩目的一位,他对隐喻用力最勤,研究成果也最多。作为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杰出的作家,他向来重视语言层面的隐喻研究,其著述中有大量对语言中隐喻现象的分析和讨论。以往对钱钟书语言成就的研究多从修辞角度展开,谈论他的比喻理论与创作的修辞学意义,但随着当代认知隐喻学的蓬勃发展,隐喻成为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隐喻研究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促使我们与时俱进,以全新的认知眼光看待已有的事物和现象。

在这样的认知视角下,我们发现,钱钟书先生的隐喻思想表现出强烈

的认知色彩,在隐喻传统修辞学观念的统治时期,他却能够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将对隐喻的思考由语言表层延伸至思维层次,明确指出隐喻的本质是认知现象,是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隐喻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在人类形成范畴概念、建立思想系统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认识都与西方隐喻理论达到高度吻合。他的研究视野极其开阔,在学术著作中对中外隐喻都进行了详尽而精到的评说,内容遍及隐喻的本质、功能、工作机制以及隐喻的理解等多个方面,其理论深度与思维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认知隐喻理论系统。

尤为可贵的是,除深刻、系统的理论阐述外,作为伟大作家的钱钟书还在文学创作中辛勤实践,自觉创造隐喻。他作品中大量的新奇隐喻,既带有明显的汉语隐喻的建构特色,又融合了西方隐喻的精华,体现了成熟、深刻的认知隐喻思想,也是其独特隐喻理论的绝佳印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钟书先生是中国隐喻研究的集大成者和全新隐喻认知研究视角的开辟者,对其隐喻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对于重新评估钱钟书先生在中国隐喻研究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汉语特色隐喻研究的深入也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 研究思路和方法

在此背景下,本书将展开钱钟书隐喻认知理论的研究,对其理论进行梳理和提炼,较为全面地展现其隐喻理论体系,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其隐喻认知思想进行提炼和阐释,以重新定位钱钟书先生在中国隐喻研究史上的地位,并为我国当代隐喻学的建立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目前对钱钟书隐喻思想的研究主要分为修辞学派和认知学派两类,两派之间没有形成互通,大大影响了对钱钟书隐喻思想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在系统梳理国内外隐喻研究概况以及对钱钟书隐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打破当前钱钟书隐喻研究修辞派和认知派不相往来的局面,以隐喻认知理论为参照,对隐喻学巨擘钱钟书的理论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中的隐喻思想与理论进行整理,使用内省和思辨的方法,从认知维度对其进行剖析和阐释;同时采用语料分析的方法,对《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宋诗选注》中的众多隐喻实例进行考察,寻找其隐喻创作与理论之间的联结点。在综合

其隐喻理论与实践创作的基础上,对钱钟书先生的隐喻本质论、隐喻功能论、隐喻工作机制、隐喻始源域选择与实现等方面进行全面解读,将其独特的认知隐喻思想与中国传统隐喻思想、西方隐喻认知理论做相应比较,进而探讨汉外隐喻在认知模式上的不同,帮助读者对隐喻认知与语言、文化、民族心理、思维等方面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为隐喻的普遍性与相对性研究加以补充和完善,并希望此项研究对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学及跨文化交际等方面都有所帮助。当然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否定以往修辞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是力求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为考察钱钟书隐喻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视点,为重新认识我国隐喻研究进程中的进步思想提供参考,也为早日建立汉语隐喻理论提供一定基础。

三 研究焦点

在我们对钱钟书隐喻理论体系的考察中,涉及一些核心问题,本书的研究也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些问题包括:

(1) 钱钟书先生作品中有大量特色隐喻,这些隐喻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为什么隐喻创作成为他文学语言的一大特色?是否有自觉的隐喻理论为指导?他的隐喻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隐喻到底是什么现象?是传统认识中的语言现象、修辞现象,还是一种认知现象?钱钟书先生对隐喻的本质有怎样的认识?

(3) 如何看待隐喻在语言中的修辞功能?隐喻还有哪些功能?隐喻的修辞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有何关系?

(4) 隐喻构建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

(5) 如何看待隐喻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钱钟书如何解决隐喻构建中相似性和差异性、“一”与“不一”的矛盾?

(6) 隐喻是否符合逻辑?构建隐喻是否考虑其逻辑性?

(7) 隐喻构建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做到隐喻的“切至”,达到“合则肝胆”的效果?

(8) 选择怎样的隐喻始源域,才能使隐喻产生新奇效果?

(9) 隐喻的映射如何实现?钱钟书先生创造的隐喻体现了哪些类型的映射形式?

(10) 如何看待隐喻构建中施喻者的关键作用?

- (11) 如何认识中西隐喻的异同?
- (12) 钱钟书先生在具体隐喻形式的探讨方面有哪些独特创见?
- (13) 他有没有明确表示对隐喻认知理论的认同?

通过对钱钟书先生相关著作的梳理、分析和提炼,我们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究,发现在其隐喻理论中,已经涉及这些隐喻研究中基本问题的分析和思考,许多认识都体现出鲜明的认知色彩。

我们发现,钱钟书先生的隐喻理论成熟、全面、深刻,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隐喻理论体系,对很多问题的阐发都显示了独特的隐喻认知眼光,这些理论思想影响到他的隐喻创作,使其创作呈现出明显的理论自觉性和无穷机趣;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早期文学作品中隐喻创造的经验也经过多年的思考与积淀,形成了深邃的理论认知,因此,钱钟书先生的隐喻理论与创作做到了相互系联,交相映发,如合辙造车,也体现了他善于对事物现象通观圆览的学术观念。

在对日常语言和中外文献中大量隐喻现象考察的基础上,钱钟书先生认识到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并明确指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都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所谓移情、通感等现象都是特殊的隐喻,这就为揭开隐喻的神秘面纱、揭示其深层工作机制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他认识到隐喻在语言中的修饰作用只是它众多功能之一,除此之外,隐喻还有帮助人们社会交往的社会修辞功能、游戏功能、认知功能、创新功能等,其中最为本质和核心的是认知功能。

钱钟书先生认识到隐喻发生在两个事物之间,是一事物领域向另一事物领域的映射,隐喻的前提和基础是跨域性和相似性。隐喻构建中,相似性一直备受关注,但是传统修辞学只注意相似性及其效果,并不关心始源域的转移和实现过程,更无法解释施喻者如何挖掘和创造相似性成为隐喻两造的联系。钱钟书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隐喻的总原则是“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以其伦”,“物虽胡越,合则肝胆”,隐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应该是辩证的统一,这就解决了隐喻两造之间“一”与“不一”的矛盾,其思想科学而辩证。在此基础上,他对隐喻的相似性做了进一步区分,指出相似性的发现和创造需要施喻者的个性认知,需要转变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努力创造恰当的相似点将隐喻两造联系在一起,满足隐喻构建的“切至”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意隐喻构建的逻辑性,隐喻并不像哲学和科学所认为的那样不符合逻辑,而是不受逻辑的束缚,